



女御史

王吉星

秦岭文学丛书

女御史

王吉呈

陕西人民出版社

秦岭文学丛书

女 御 史

王 吉 呈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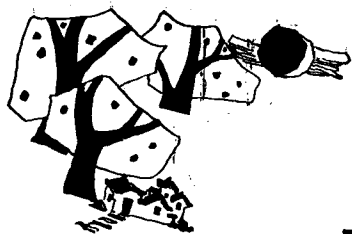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53,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500

统一书号: 10094·497 定价: 0.73 元



目 录

关于王吉呈的小说（代序）

……………刘建军（ 1 ）

青 春 号……………（ 15 ）

春 雪 初 化 ……………（ 27 ）

上 李 村……………（ 41 ）

风 匣 雷……………（ 57 ）

巧 姐……………（ 68 ）

空心皂角树……………（ 80 ）

丑 女……………（ 94 ）

道德公审会……………（ 104 ）

女 御 史……………（ 118 ）

弥 留……………（ 136 ）

文 嫂……………（ 148 ）

陪 嫁……………（ 156 ）

六 老 婆……………（ 162 ）

七月，在棉田里……………（ 171 ）

红 袄……………（185）

五大爷传奇……………（197）

公 道 婆……………（213）

线 戏 人 儿……………（227）

附录：文学之路投足记

……………（240）

关于王吉呈的小说(代序)

刘 建 军

我和王吉呈同志熟悉，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虽然他也曾在我求学、工作着的西北大学的校园里度过他的青春岁月，但在我的印象里，那时我们并没有过任何的接触。最初的相识，和后来不太多的几次交往，都是在最近几年的文艺界的活动中。因为说起来，还有一层校友的关系，互相便觉得似曾早就相识。

不过说老实话，他使我感到谈得来，还有一层更深的情感的心理的因素，这便是他给我的直觉印象：质朴的外貌，涤卡制服里的土布衬衣，脚上套着的手工制作的圆口布鞋，习惯于蹲而不坐的姿态。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着，他是来自关中平原农村的并挚爱着他的家乡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人处处都露出他的本色本相，不矫饰，无需更多的了解，便令人觉得可以信赖。这样的直觉印象，加上后来交往中的与此相一致的感受和认识，使我自信地觉得，我是了解王吉呈同志的。当然，真正谈得上的哪怕是肤浅的了解，

也还是在我较系统地读过他近年发表的大部分作品之后。

王吉呈的短篇小说是有特色的。且莫轻看了这点。许多搞创作的人，因为作品始终缺少特色，终于被别人的作品所淹没。能使自己的作品显出一定的特色，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就等于夺得了自己创作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尽管今后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和曲折，这却不能不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取得社会公认的第一个关隘。自然，有特色并不等于有了一切，而无特色却相当于一切皆无。

造成文学作品特色的，主要是作家的个人审美趣味和个人的特定的传达方式。生活的复杂现象和多种色彩，是经过不同作家的聚光镜、折光镜、凹凸镜，而显现在不同的作品中的。为什么反映此而不反映彼，为什么如此反映而不如彼反映，不能不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点。从局限的范围看，也就是从更直接的原因看，这都取决于作家的审美趣味和逐渐形成的个人特定的传达方式。王吉呈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曾借用两个朋友劝告他的话，把它概括为“用家乡话写家乡的人和事”。这虽不是普遍适用的创作诀窍，却是特定的一类作家的极诚实的夫子自道。

这一类型作家，选取的题材，描绘的人物，运用的语言，多采自作者自己熟悉的家乡生活和人物。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了特定的乡土气息。王吉呈作品的特色，也正是通过特定的风土人情而透露出来的。黄河岸边农村里的红白喜事，庄院里的口角纠纷，普通劳动者的喜怒哀乐，棉田

里的歌声笑语，钻天白杨树下的农事交谈，抽水站月光下的成双倩影，农家炕头厨下婆媳妯娌之间的矛盾与和解……，都带有浓厚的渭北高原的色彩，透露出强烈的对生活、对生活的主人农村劳动者的赞颂。

能爱能恨者才能为文。从现象上看，一些善写乡土民俗文学作品的作者，得力于自己选取的特殊题材。实际从本质上看，还是取决于作者对这种特定题材生活的熟悉和热爱。没有对生活的熟悉，就不会有逼真的描绘。而没有真诚的热爱，便缺少了创作中最不可少的情感动力。无动于衷，无可无不可，或矫情做作，都不能使创作萌生，或是在其萌生的时候便抽去了它的生命，产生出没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即使有高超的艺术技巧为其帮衬，也只能是一些徒具华美外表的纸花蜡果。情感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一部分。作者的爱憎是推动他创作的动力。

王吉呈用家乡话，写家乡的人和事，似乎是受了两个搞创作的朋友的启发，内在的真正的原因，勿宁说是他对家乡的热恋，他对自己童年、幼年以至成年还是休戚相关的乡亲们的眷念。这种感情可能从童年就伴随着他，一般的也是在童年时代扎着它的深根。后来尽管离开了故乡，岁月冲印，这种感情却是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这种眷恋故乡的感情，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质和习惯；假若要搞创作，也会影响到作者的创作内容和风格。或许会有例外，王吉呈却不是个例外，从气质特点到创作风格都有着鲜明的印记。假若一件土布衬衣和渭北农村的生活习惯，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

那么他一篇又一篇的作品，抒写着的总是他的故乡的一切，却实实在在地证实了，他是有着浓厚的乡恋之情的人。

王吉呈正是在这种爱的感情的推动下，开始自己的创作的。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一首首赞歌。赞美故乡的自然景色，赞美渭北农村的风俗人情，赞美属于乡亲邻里的叔伯婶子和兄弟姊妹们、更年长和更年轻的乡党们，赞美她（他）们朴实的生活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令人欣喜的各种变化。

作者在自然景色的描写上，并无独到的功夫，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没有强烈的感受到或没有要传达这种感受的强烈的欲望，所以没有写出足以称道的精采篇章。但是，由于作者在平实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上倾注了爱的感情，因之他笔下的渭北棉田，渠岸路边的白杨泡桐，都显依依之情，唤起人的乡土之爱。

当然，这种爱的感情，更浓重地体现在风俗人情的描绘上。一件绣着莲花鸳鸯的肚兜，一匹二尺二宽的红边布，脱服日的一身红袄，看闺女的一竹笼红玛瑙红宝石般的马牙枣，一对热气腾腾的花馒头寿礼，一只红漆描金方盘中的四碟炒菜，都是多么地能唤起人的遐思畅想呵。这些特定的带有民族色彩和地方情调的事物，交织着男女主人公生活的历史与现状，体现着他们的思想情绪和道德风尚。作者描写这些事物，不是以一种城里人的猎奇的眼光，而是以一种如数家珍的心情，充满了爱怜，洋溢着赞赏，烘托它，显示它。这些东西，以特有的感情色彩，向人们叙说着它们的男女主人公的朴实宽厚和智慧灵巧，昔日的爱情，今日的烦恼，生

活变迁中的喜悦，矛盾纠纷中的心肠，也同时把作者对自己主人公的命运和生活的深切关注之情，涓涓流出。

真正使作者动情的，是故乡的人们。他们对生活的执着，对劳动的热爱，对传统美德的尊奉，对纯朴习俗的眷恋，对故土的忠诚，对新生活的希冀，这些才是使作者真正恋乡的根底。由爱故乡的人们，到爱故乡人们所爱的一切。他们生活的土地，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一草一木，甚至爱他们受过的苦难，爱他们身上并非都是闪光的一切东西。

为一些评论者所推重的作者对近年来农村新形势的赞美，显示了作者对生活变化的敏感和政治热情。可以看出，由于时代精神的感染，王吉呈近年写出的作品，大多是赞美农村实行新的经济管理制度而带来可喜变化的。《上李村》、《女御史》、《铁脖项拜寿》、《巧姐》、《七月，在棉田里》、《六老婆》、《风匣雷》、《空心皂角树》等，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人的思想感情变化上，反映着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弊病，农民的积极性有所调动，带来经济收益的增长，物质生活的改善，新的道德观念的深入人心。总之，眼前是生机勃勃，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近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和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股热浪的冲激，就是一般和农村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的城市里的工人、干部、居民，也感受到它的热力。写农村题材的作者，不看到这个事实，不作出应有的反应，不能够认为是正常的。问

题在于，当作者对此做出敏锐的反映时，会不会重蹈写政策、写中心的故辙？会不会被人视为赶浪头？这是许多读者普遍担心的问题，也是许多作者颇犯疑心的问题。我觉得担心、疑虑得有道理。谁也不能保证，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不再重犯。特别是在人们对文学的功能有着狭隘的理解的思想还没有彻底克服的时候。让历史的明镜常悬我们的当头。

怎样的描写，才算是很好地反映了当前现实生活？怎样的描写，是图解政策的？有时不是那么容易明确地划出界限和条文的，但任何时候，读者都可以突出地感到这两类作品的不容混淆的区别。从读者的感受看，作品只要着重了写人，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的各种关系，饱和着情感，就不能说是图解政策的作品。作品涉及不涉及具体政策，倒不是问题的关键。需要写具体政策时，还不能回避，它也可以成为现实主义不可缺少的细节真实的组成部分。图解政策、写中心的作品，则把人当成了模具，忽略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揭示，作者对他描写的对象缺乏血肉相联的感情，自然也不能以情动人。说到底，还是个文艺的特性问题和文艺反映现实的真实性问题。这两者都要求，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以形象思维的方式研究人生，反映人生。而图解政策的作品，恰恰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

我不想说，王吉呈的作品在这方面取得了多么显著的成绩。我只是想说，他的作品并不给人们以描写政策的印象，虽然他的作品很注意反映农村实行新的管理制度后的形势，很注意描绘事件，但是他没有忽略了写人。所以，王吉呈的

作品，不乏鲜明的人物形象，自有其感染人的力量。在这里，我还想说一点并非题外的话，也算是对文艺评论的一点希望吧。这就是，我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不要简单化地以是否配合了当前的政治为衡文的标准。那样不仅褒贬会失当，而且还会把创作引上歧路。这也绝不是要作家脱离政治，不关心当前现实。文艺和政治本无法脱离干系，文艺和现实也并不能远离。只是这种关系，有它的特殊性，是一种更深广、更复杂的内在联系，甚至是完全隐蔽的联系，只呈现出心理的、情感的、时代气氛的联系。文学作品要反映这种关系，要通过作家的特殊发现才会具有审美意义，人云亦云地重述政治家的观点、哲学家的思想，就会形成图解政策或形象化的哲学说明，就会是一种拿不出新鲜货色的宣传。谁爱读这样的所谓文学作品？

注意了文艺的特殊性，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掌握现实，革命文艺紧密自己同革命政治的关系，密切注意当前现实，倒会使文艺始终充满活力。高尔基的《母亲》和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名著，就是有说服力的例证。那么，列宁盛赞高尔基的《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是否也是在运用简单的衡文标准，着眼于它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不能这样认为。高尔基的《母亲》没有简单地配合无产阶级政治，列宁也没有从狭隘的功利需要肯定这本小说。《母亲》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工人从自发走上自觉斗争的觉悟过程，非一般配合、图解的笔力所能胜任。列宁赞它，是从时代和整个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上着眼，评语也很原则，是一种大方

向上的肯定，并没有代替美学的具体分析。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任何片面、简单化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要求文艺图解政治是错误的，认为文艺离政治越远越好，也是错误的。

让我们再回到王吉呈的作品上来。王吉呈敏感地反映当前农村的现实，并不想远离政治，努力于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是应当肯定的。假若说，他这样做还有什么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使人挑剔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反映当前农村现实时，有时候还局限于某种具体的思想观念，眼光还不够开阔。作者看到了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新的经济管理制度带来的巨烈变化，感受到故乡人们的一些喜悦，抑制不住地要赞美，要歌唱。但是，生活的内涵，并不一定是引起作者创作冲动的那些生活现象。农民思想感情深处的波动，作者也不一定完全把握到了。这是要做纵深探讨的。要透过当前，深入到过去，由此到彼，由表及里，真正深入到描写对象的血液和心脏里去体验，去研究的。作者在这方面似乎还有缺欠，一些作品常局限在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上，缺乏反映现实、揭示社会的纵深感。例如《上李村》这篇较优秀的作品，深究起来，三老汉和儿媳妇巧燕的矛盾，来的突兀，解决的也容易。作者把自己局限在实行责任制这个中心思想之上了，对于农村两代人新旧思想的矛盾把握的还不够丰富深入。《青春号》、《春雪初化》、《丑女》、《四月，未扬的麦花》都有同性质的不足，作品的主题思想压倒了人物形象，压倒了作品的生活容量。

对于短篇小说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否有些苛求？我想，

文学评论经常提到各种具体和笼统的要求，要求作家应当如何深刻丰富，应当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般的深邃，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近于无理取闹。但是，作为一种创作问题来研究，探讨作品如何才能更深刻的反映现实，不仅适用于长篇巨制，而且适用于短篇、小诗的创作。要求作家深广地反映现实生活，绝不是向作家提出一般的提高思想认识的要求，它最根本的是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深入人的思想灵魂，找到自己独特的体会和发现。换句话说，明确的理论指导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有助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但是真正直接促使作家写出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还是作家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和体会而作出的对社会、人生的评价和判断。

在文学创作中，深刻和独特几乎是相伴而生。独特之处，见深刻；深刻之处，成独特。人云亦云，图解概念，不见独特，也绝不会深刻。人们要求文学作品的深刻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社会本质的开掘，而是通过特定的角度和感受，对一定物质形态上形成的人们社会心理和思想感情的揭示。在这里，对描写对象的思想感情的何种程度的把握是很重要的，作者思想感情上对描写对象的何种程度的反响、共鸣同样也是很重要的。这两方面，只达到一般化的程度，作品就会泛泛，只有这两方面的同时深入，创作出的作品才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思想内容上显得深刻。因为它是独特的，它是特定作家个人感受、体会、认识的产物，它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之上增加了新的内容。文学作品的深刻性和

独特性便是如此不可解地结合在一起。作家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认识和发现，是作品深刻的决定性的因素。同样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作品，《最后一课》的作者都德，却通过一个顽皮的小学生的最后一节法语课的感受，揭示了一个民族失去独立时没有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悲痛愤懑的感情。它是深刻的，也是独特的。爱国主义主题，是文学作品重复了千百年的内容，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思想。然而，都德却能创新，能深掘。从人民与民族语言的关系上，揭示爱国主义是都德的发现，表达出的那种真挚强烈的情感是都德的深刻体会。足见文学的深刻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本质的把握，而是和作家的独特发现、深刻体验紧密联系着的人们思想感情的开掘。作家的发现和深刻体会，是形成文学作品独特性和深刻性的最根本的东西。

王吉呈反映当前现实生活作品所出现的某些不足，也正需要从这个根本方面寻找原因。作者是敏感的，能迅速地反映出生活中的一些新的变化。这说明作者有所发现。但是，这种发现，不少时候还停留在生活现象的捕捉和感受上，没有深入到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入认识，特别是对描写对象的深藏的思想感情的体察和挖掘上。另一方面，作者虽是怀着爱的感情塑造作品的主人公的，但因为对她（他）们熟悉、了解、体察的深度还不够，因之，作者与描写对象之间的感情相通、血肉相联、命运与共的程度，并未达到极致，其灵魂的开掘，其情感的体察，都使人有未能深入骨髓之感。这里我谈一点不准确的推测：作者写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不少

属于耳食之言，是听别人说的故事或是某些地区流传的轶闻趣事。这些口耳相传的事件或人物，是孕育于群众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自免不了带有一定的泥土味儿，信手拈来，倒不失天然的芬芳。然而，若未能经作者自己生活体验的强有力地改造，它就会缺少新鲜感和深厚的情感力量，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又不得亲近之感。以上议论收拢起来说，王吉呈反映当前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虽有发现的成分，也颇富情感色彩，但终因对生活的熟悉、开掘的纵深程度不够，对人物的思想情感的体察未能入微透底，作品的独创性和深刻性便不能不受影响。又因作者受结构戏剧冲突作品的影响，注意力较多地放在故事上，在结构作品时，自觉不自觉地容易从情节出发，淡视了从性格出发。这不是说在短篇小说创作中，性格重要，故事情节不重要。能把两者结合得很好，一般较受读者欢迎。仅一个方面突出，也可构成佳作。但是故事小说，容易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刻划，常常落入一定的程式，缺少耐人思索回味的思想艺术力量。

作者是意识到了结构有戏剧性冲突的故事小说的缺陷的，他似乎在努力摆脱这种创作路子对自己的影响。八二年发表的作品，大多改变了原来的写法，常是一篇着重刻划一个人物，有着历史的追溯，把不同的生活片断，以人物性格为中轴串联起来。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开掘题材上的努力。但可能在形式上还未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可能最根本的仍是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发现还有某种不足，作品总的面貌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前期作品的薄弱

之处并未彻底克服。

我觉得王吉呈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实际也是使他的作品富有光彩的地方，是他的乡恋之情浓重地表现在对于农民劳动者的聪明智慧和高尚无私品格的赞美上。他对故乡普通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力量，是衷心地挚爱和赞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描绘、歌颂农村劳动者的正直、质朴、勤劳，而是醉心于带着关中风采和气息的农村中的有威望人物的聪慧和高尚的精神的抒写。他笔下的人物，最有活力的，不是那些饱经生活艰难的磨炼者，也不是兢兢业业的勤劳的创业者，而是传统生活和传统道德培育的机智干练的生活主人。普通的农村劳动者，外貌上的质朴，生活上的勤勉，常常容易使人只注意到他们的忠厚、勤俭，而忽略了他们身上还有丰富的别的同样值得珍贵的秉赋。王吉呈却从对故乡人民的熟悉了解中，深切地感到，劳动和土地哺育的黄河儿女，有着阔大的胸怀和聪慧的心灵，他们之中有一批办事公道，是非鲜明，灵巧机智的人。这些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拥戴。

作者对这类人抑制不住自己的钦佩赞美之情，常常为她（他）们在斗争中焕发出的机智所陶醉。《女御史》的动人力量，不正是社霞的大公无私和灵巧机智？《上李村》虽是歌颂农村实行责任制的不可遏止之势的，但是篇中人物性格的闪光之处，却是巧燕的机巧泼辣。更不用说《公道婆》和《红袄》了。